

笔谈

钟伟锋
张伦
王超华
苏利利
胡平
王天成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通向民主之路： 军人的角色问题

编按：军队是独裁政权极其重要的权力支柱。民众非暴力斗争的战略规划者必须考虑如何获得军队的同情，促使军队撤销、停止支持独裁政权。从世界范围的历史看，不少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因为军队拒绝参与镇压、不再效忠独裁政权而取得了成功，开辟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道路。但也有不少非暴力行动，因为军队参与的残酷镇压，加之缺乏有效应对镇压的战略，而惨痛失败，并削弱了未来坚持非暴力的信心。

当今中国的活动分子、意见人士，在暴力与非暴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不少主张采取暴力的人寄希望于军人政变，并且以这一期待来驳斥非暴力主张。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值得探讨。理清思路有助于反抗运动的规划、开展和成功。

当大规模民众抗议发生的时候，抵抗运动最好应给军人发出什么样的信息？是号召军人捍卫自己的荣誉、拒绝镇压民众，还是更进一步，发动政变推翻独裁者？

军事政变如获成功，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权力格局，它对于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上是否有这方面重要的比较研究、统计分析可供我们借鉴？军人是否最好保持“政治中立”，让民众与独裁政权的冲突以政治而非武力方式解决？

中国的军人和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是否都有责任从1989年的血腥悲剧中吸取教训，尽可能避免大规模流血？如何避免？

受《中国民主季刊》邀请，钟伟锋、张伦、王超华、苏利利、胡平和王天成等六位人士，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以下讨论。



钟伟锋（乔治梅森大学默卡特斯中心学者、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高级顾问）：把民主转型的希望寄托在军人政变上，并以此驳斥非暴力路线，这种期待混淆了

两个必须分开的概念。政变（coup）是军人夺取国家权力，而背离（defection）是军队拒绝替政权镇压民主运动。指望军人夺权，是押错了赌注。民主转型真正需要的是背离，不是夺权。而要让镇压机器失去确定性，归根结底是一个信息问题。

先看政变。比较研究并不支持“政变能带来民主”的命题。政变后即便有选举，也常常不足以巩固民主。埃及即是前车之鉴——2013年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领导军方推翻民选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次年经选举正式上台，但随即恢复并强化了军方主导的威权统治。从更大的样本来看，威权崩溃的例子中，近一半只是从一个威权变成另一个威权而已。¹而其中最可能“还政于民”的是军政府，最不可能的是高度个人化的强人政权。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政权已高度个人化，因而不属于政变后能“还政于民”的那一类。

与此相对，非暴力路线胜算更高。从1900至2006年的数百场民主运动中，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率是暴力抵抗的两倍以上；其关键之一，正是军方的中立化与背离——面对手无寸铁的人群，士兵更难为开枪找到理由——不是政变。²

那么军队会不会背离，由什么决定？政治学者瑙尼哈尔·辛格（Naunihal Singh）在《夺权》（Seizing Power）中，基于1950至2000年间471次政变企图的数据指出，军队在危机时刻

的选择本质上是一场协调博弈——决定结局的不是谁更强、也不是某位将领良心发现，而是谁能让更多军官相信“大势已定”。³背离需要共识，而共识依赖信息。

1989年确实暴露出军队并非铁板一块的现实。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接到进京戒严命令后当即拒绝，宁可入狱也不带兵进城，部分部队迟疑观望。由此可见军方的忠诚并不是想当然的。但这些裂缝最终没有汇成一场足以改变结局的协调博弈——中共靠调外地部队强行压下了广场上的示威者。

而过去三十多年，中共在持续修补这个弱点。2016年习近平将原七大军区改组为五大战区，重塑联合作战指挥体系；2018年元旦起，武警脱离国务院，改为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无论官方动机如何，这些改革至少有一个政治效果：压缩军内协调空间，把强权集中到最高领导层手中。即便是1989年的那种迟疑观望，现在也更难出现了。

在此之上，又叠加了人工智能监控的因素。在人工智能时代，监控会更自动化，并能把检测、追踪与威慑从人转移给系统，从而减少政权对一线安全部队的依赖。只要人们认为自己时刻被政府盯着，他们横向联络的成本就变得很高。从协调博弈的框架来看，这会削弱背离所需的共同知识。这正是呼吁军人拒绝开枪越来越无力的原因。军人没有变得更忠诚，只是政权更善于阻止他们横向联络而已。

那么支持民主一方还有没有筹码？其实还有，恰在信息这一端。镇压依

赖命令、宣传、动员和对局势的“定性”，因而政权必然要在官僚语言里留下痕迹。我和合作者开发的开源项目“政策变化指数”（Policy Change Index, PCI）中有一个针对镇压的模型，通过机器阅读《人民日报》的官方宣传，能从官方话语中识别由“游行”转向“动乱”和“暴乱”的转折，从而推断镇压风险上升、官方定性转向的信号。换言之，镇压有其“指纹”。

那支持民主一方该向军人发出什么信号？我认为不应是号召他们夺权，而应是传递一个可信的“大势所趋”的信号，让背离重新成为他们的可能选项。民主运动真正的优势不是政变，而是开源的预警与协调。谁能更早识别镇压链条中的裂缝和犹疑的信号，并帮助人们横向联络，谁就更可能让镇压机器失去确定性。六四给双方的真正教训，不是“军队也许会救我们”，也不是“军队一定会镇压我们”，而是那场镇压其实有迹可循。

下一次，谁能赢得信息之争，谁就能决定结局。



张伦（法国赛尔奇 - 巴黎大学教授、1989 年学生抗议领袖）：军人在民主转型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多年来各国学者多有研究，即对所谓“转型守门人”（the Gatekeeper Proposition）的探讨：它在面对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及反对派的挑战时，选择或拒绝镇压，关系转型成败；军队不可能单独达成民主，但却能决定民主能否建立。至于军队在转型中为何扮演了不同角色，最终态度的取舍，牵涉诸多其内部结构、运作方式，军队文化以及转型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国际环

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以 1974 年被亨廷顿视为第三波民主发端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为例，假如没有那些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领导的“武装部队运动”，那场革命是不可能发生也很难最后成功的。但那场运动的产生，则又是与整个二十世纪葡萄牙军人的历史以及当时的情境条件有关的。之前有过的数次军人起义与政变，指向不同，都决定性地影响了葡萄牙的世纪进程。如 1910 年 10 月推翻长达八个世纪的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就是由里斯本的共和党士兵、水手以及平民发动起义引发的。但后来，激进的改革，各种内外因素，包括政治派别冲突造成政治与经济长期不稳定，又导致 1926 年的军事政变。此次政变之后建立了所谓的“第二共和”，亦称“民族专政”（Ditadura Nacional）政权，大学经济学老师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被执掌军人政权的若热·门德斯·卡贝萨达斯（José Mendes Cabeçadas）将军任命上台，开始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威权统治时代，其中军队一直是政权的最重要支柱。但随着葡萄牙在应对殖民地爆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陷入困境，高级军官利益与政治绑定固化，下级军官晋升制度上遭遇不公，军队内部挫败与不平感日增，最终又是军队终结了这个政权。是中下层军官们的选择，以及他们与和社会有极强关连带且厌战的义务兵结盟，带动了军队上层，决定了军队的走向。

以此来引申，探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军队的可能立场，也需要对军队内部结构，制度运作，包括对不同军人与权力体系的关系和对社会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军队的文化跟传统等等做更细致的分析，这样相关讨论才有意义。例如军队内部高级军官与中低级军官利益同构或

冲突的问题，又如现行法律名义上是义务役与志愿役相结合，但事实上以志愿役为主的征兵制对军队构成及立场可能的影响，再如受整体制度及社会环境左右衍生出来屡禁不止（已带有制度化特征）的大规模军队腐败及其后果，还有因军事现代化进展而有所强化的军人职业化趋势对型塑军人的自我认知、社会认知、以及军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倾向的作用等等……因各种显见的原因，我们缺乏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条件，但起码要有意识且努力对每一个问题都尽可能做些细致研究，才不至于在军队与转型这个问题的讨论上陷于“空泛相因”，无的放矢。

以腐败为例：一方面因害怕利益受损，军队尤其是高级军官，对民主变革可能持敌视态度；但另一方面腐败也可能软化军官们固化的意识形态精神结构，这是否有助于将一些权力问题转换成可量化的利益计算呢？至于军队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忠诚问题，随着那批在文革期间为躲避去乡村或工厂从事严酷劳动，借助父辈关系进入军队，后成为高级将领的红二代陆续退役，未来民主转型中军队中立的可能性与“六四”期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弱化了？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王超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兼职助理教授、1989年学生抗议领袖）：未来中国发生变动、催生民主化进程的时候，军队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什么作用？

四十年前，追求民主化的中国人很少提出关于军队的问题，但 1989

年的六四镇压使得所有人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历史和未来交汇在这里。就像未来可以从假设开始一样，历史研究也是容许反事实假设的（也即英文中的“counter-factual history”）。过去几年遇到的一些与此相关的假设情境，我以为有助于思考这个问题。

在回溯六四历史时，吴国光教授的“军事政变说”认为，非程序军事调动为非程序最高层人事变更奠定基础，之后发生六四血腥镇压，这是中国式军事政变的三个重要步骤。苏阳教授殊途同归，也将动用军事力量置于社会运动造成的权力动荡和选择政治接班人的框架下考察。这类研究引起人们（包括我本人在内）提问：赵紫阳身处高位，既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又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如果他像叶利钦那样站到抗议民众一边，与邓小平等人正面对抗，军队是否会因为他的正式身份而跟他走？或者，军队会不会因此而坚决保持中立不介入的立场？

“抗命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庭审视频流出后，北京军区第28集团军何燕然军长和张明春政委率部抗命的情况也渐为人知。设若这几位将军不仅仅是各自（或联手）率部消极执行命令，而是坚持本部不介入，甚或如罗马尼亚军人对齐奥塞斯库夫妇那样采取主动行动，或者像张学良那样“兵谏”，是否真会发生当时盛传的诸如“38军和27军打起来了”那样的军内火并？

曾有一位留学生在“白纸”抗议后的政治讨论中问我，如果中国发生动乱，而不少驻扎湖南的河南籍军人，有可能被家乡父老召回，抢劫河南本县附近的军火库，割据一方，你们民运人士如何回应？我当时对这类问题毫无准备，匆忙岔开了话题。但他提出的假设需要更明确

的回应。

这些假设性提问至少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方向来探究。一个是中国人对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的心理恐惧和厌倦，另一个是中共治下的党军关系对军队内部指令传输架构的影响。以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发展程度来说，虽然很难绝对排除，但政治动荡引起军阀割据的可能性应该说已经大大减小。同时，军队对社会和平民的威慑力，不仅在于其武力，尤其在于其基于内向忠诚度的令行禁止。离开原有建制的散落军人，除了个人英雄，很难在地方文官率领下实施有效割据。军阀割据重现的最大可能，恐怕还是个别中下级军官能够把成建制的军事单位成功带出来，置于自己脱离原有体制的绝对指挥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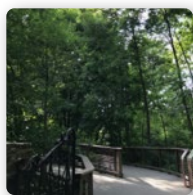
为什么说只有个别中下级军官有割据可能？这是因为中共治下特殊的党军关系。中共军队的内向忠诚度始终建立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之上，党主席 / 总书记理应兼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时期虽然属于例外，但即使名义上可以指责他“以枪指挥党”，但实质上职业军人仍必须听从“党”的指令。徐勤先的部下无疑非常想保护他个人，但却不会表态说跟著他走，指哪打哪，无视更上层的指令。“党指挥枪”在习近平时代发展得尤为极端，前面的各种假设完全可以替换成假如张又侠提前动手会怎样，而且海外确曾有人这样提过。这就可以看出，从林彪到张又侠，哪怕军事长官在军队内部已经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无法利用部队对其个人的忠诚度来保护自己不受清洗。

“党”及其“领袖”的权威永远高于具体的指挥官。张又侠等一大批高级将领被清洗，中高层将领跃跃欲试争夺空位，显示出中共军队内部行事看上级眼色的痼疾。这也是美方观察人士判断解放军高度中央

集权，缺乏灵活度和实战经验的原因。

在这种背景条件下，面对突发政治动荡时，我以为最高期待还是只能放在军队不介入上面，对个别指挥官做工作很难有实际效果。而一旦民主进程启动，推动者就必须尽快以“军队国家化”取代“党指挥枪”，建立军队向国家效忠的原则。

苏利利（社会正义与社群参与工作者、研究者）：我重点讨论军事政



变为何难以带来自由民主。判断军事政变能否带来自由民主，关键不在于军队是否推翻政府，而在于军队是否受制于一个真正限制权力的宪法秩序。在自由民主国家，宪法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自人民主权，它既确立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也限制军队行为。在此结构之下，军人的天职不是“无条件服从”，军队的行为必须符合宪法的授权。

然而，在专制政权和混合型政权治下，军队跟国家的关系至少有以下两种类型：

1. 在第一类国家，军队成为“国家监护人”，往往表现为军队头脑可通过政变掌握权力，或容许文官政府在军方划定的范围内执政。在这种政体之下，军队虽名义上属于国家，本质上却凌驾于文官政府与法律之上，成为政治秩序的最终天花板，如泰国、缅甸、巴基斯坦和苏丹等。另外在拉美，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的前军事政权也曾属于此类；玻利维亚、秘鲁和厄瓜多尔则仍呈现不同程度的不稳定性。这些国家并非完全相同，但若军方掌权则对文官政治有最终否决权。

2. 在第二类国家，军队从属于政权，充当“政权安全的保护者”，军人异化为“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的暴力工具。从当代历史上看，军事政变在这类国家很少发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军队没有独立性，同时军队首领与最高掌权者之间的权力差距太大，如中国、朝鲜、伊朗、白俄罗斯以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图一 军队主导政体的循环政治

在这两类政权之下，都有过很多的民众起义并被血腥镇压，如历史上的阿根廷和现今的伊朗。

这样的政权，其脆弱性互不相同：

在第一类国家，政权持续高度依赖于军队维持国家主权独立的承诺。这类国家常会见到如图一所示的政治生态循环。在这些国家，军事领导人即使在不直接掌权的情况下，其存在本身也是对政权的威胁，而

公民社会虽可存在，但其社会运动往往遭到暴力干预并导致军方直接掌权。如泰国 2014 年政治危机导致军方直接接管政权；苏丹 2019 年民众起义推翻巴希尔（Omar al-Bashir）政权后，军方以过渡安排的形式保留最终权力，并在 2021 年再次发动政变，最终不同军方派系间因争权而爆发内战。

在第二类国家，如伊朗，其倒台过程会更为复杂。该类国家政权即使在对外的军事冲突中失败，其合法性遭到严重打击，但因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保持控制，就可观察的案例而言，从其军事失败到丧失政权之间或将经历很多年，如清朝从 1840 年起，历经 70 年才倒台。

军事政变，在军队监护型国家，只是政治生态的新一轮循环；而在政权控制军队型国家，即使发生军事裂变，也更可能引发夺权斗争或内战，而夺权的军队很少会主动将权力还给人民。因此，军队是否被置于人民主权与宪法之下才是关键而非政变。



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在民主转型中，军队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的八九民运就是被军队使用重大杀伤性武器镇压下去的。

有人批评说，中国八九民运的失败，败就败在学生和民众对中共产有幻想，而最大的幻想莫过于以为军队不会向民众开枪。这种概括过于简单

化。首先，当时的人们并非幼稚到以为“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要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民众自发地去拦阻而不是欢迎军队进城呢？再者，民众也不是不担心军队会镇压民运，所以他们才夜以继日地向军人宣传喊话，要求或鼓动军人拒绝执行戒严令。

批评中国人对共产党抱幻想的人，照例称赞东欧人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可是，如果说最大的幻想就是以为军队不会开枪，那么东欧人恰恰是抱有“幻想”的。手无寸铁的东欧人走上街头，他们当然不是去迎接子弹，他们是通过展现真正的人民的意志，打动当局及其军队中多数人的天良，分化瓦解专制统治集团。

“六四”屠杀招致世界各国的普遍谴责，但也有例外。例如东德共产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等强硬派公开赞扬中国的镇压行动，表示要向中国学习。然而，东德民众并没有被吓倒。在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爆发大规模示威，约7万（一说高达10万）民众走上街头，高呼“我们是人民！”东德政府则集结军队和警察准备镇压。接下来，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促成了东德共产党高层分裂，强硬派失势，示威活动和平落幕。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民主运动。一个月后，柏林墙倒塌，第二年，两德统一。

一方面，专制政权就是靠着枪杆子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另一方面，专制政权之所以会垮台，就因为在一定情况下，统治集团会分裂，镇压机器会失灵。正如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所说：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

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各国非暴力抗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例证。

以为共产党的军队不会向民众开枪并不一定是幻想。如果共产党的几百万现代装备的军队始终铁板一块，唯党命是从，那么共产政权的转型将是很难想象的——除非出了戈尔巴乔夫。我们必须相信，军队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批判“六四”屠杀的罪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激发军人的道义良知，就是为了改变军心。

在当今中国，民间不具备进行暴力抗争的物质条件。搞政变必须是高层，搞兵变必须是军人，民间无法直接参与。我们仍然要坚持非暴力抗争。我们应该做的是，用我们的文字与理念，用和平的集体行动所展现出的意志与力量，去影响和施压于那些高层的人以及军人。



王天成（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季刊》主编）：“当我们谈论反抗的时候，应该问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等待某个或几个将军来拯救我们。军事政变即使发生，其前景也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在《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2期的笔谈中，我曾这样写道。在此，我想先重申这一看法。

反抗的主体应该是民众，而不在别处。不要坐等军事政变，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军队角色问题之重要，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不只是不可回避的，还必须纳入战略考虑。那么，对于战略规划者而言，

在发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是积极争取军队背弃独裁者、拒绝开枪镇压民众，还是要更进一步，鼓励、号召、支持军人发动政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分享几项比较政治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

- 在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情况下，军事政变的机率会显著上升。根据 1951-2005 年的案例统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比平时高大约 2-3 倍，而且，非暴力反抗要比暴力更可能激发军事政变；⁵

- 尽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会提升，但机率显著低于军方拒绝镇压、中立或站在抗议者一边。在 1946-2014 年发生的被称为“专制终结游戏”的 40 个大型抗议中，军队拒绝镇压的有 15 个，政变只有 6 个；⁶

- 冷战后的军事政变在 5 年之内举行选举的比例显著高于过去，但多数没能导致高质量的民主，而是建立了“竞争性威权政体”，或不久后回归完全的威权统治；在曾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有相当数量后来又重复发生政变。⁷

这些研究值得给与认真对待。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军事政变的人，并没有想过军事政变可能导致的复杂情况。与军人抗命、拒绝镇压不同，军事政变意味着接管政权。从那一刻起，主动权将落于军方。军队将处于国家政治方向掌握者的地位，承担起并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这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军人领导的过渡政府可能会承诺制定新宪法、举行民主选举。它未必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以“秩序”、“防止国家分裂”、“为民主做准备”等名义无限制延迟甚至取消选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军方兑现承诺，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仍会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者行事，在转型期间制定的新宪法中固化——或试图固化——其政策偏好”⁸。它所设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力图保证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宪法，并可能在新宪法中为自己保留实质性政治权力。⁹

或许有必要略举几个例子，以更清楚说明在政变情况下民主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2011年，埃及军方在民众抗议中接管了政权，然后制定宪法、主持选举，2013年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1991年，马里军人停止了射杀和平抗议者、调转枪口推翻了独裁者，然后在2012、2020年两次发动政变，中断并最终结束了民主。

1988年，我们的邻国缅甸发生民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并在不久后开启了选举，但软禁了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而且拒绝接受这个政党接下来压倒性的胜利。另一个邻国泰国的政治现代化最早是1930年代军方通过政变开启的，军队从此在政治中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这个国家后来政变次数之多，不能不让人惊讶。

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即著名的“康乃馨革命”，不只成功在本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也揭开了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但它的成功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外。

最后，我还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技术中还有个重要概念，叫“支撑性力量”（pillars of support）。军队无疑是独裁者最关键的支撑性力量之一。研究发现：非暴力反抗运动如果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更有可能促成这些力量背离独裁者，从而提高运动的成功机会。¹⁰

至于“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意味着什么、如何做到，已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但值得有志于反抗运动的人给予特别关注。

此外，我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战略也应包括如何应对镇压的计划。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当镇压发生的时候，如何顶住镇压继续抗争，从而使镇压归于无效。不能指望非暴力抗争没有任何伤亡，但应尽量避免1989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血。

注释

- 1 芭芭拉·格迪斯、约瑟夫·赖特和埃丽卡·弗兰茨，《独裁政权的运作机制：权力、权力个人化与崩溃》[Barbara Geddes, Joseph Wright, and Erica Frantz, *How Dictatorships 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 埃丽卡·切诺韦思和玛丽亚·J·斯蒂芬，《为什么公民抵抗会成功：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 璫尼哈尔·辛格，《夺取政权：军事政变的战略逻辑》[Naunihal Singh, *Seizing Power: The Strategic Logic of Military Coup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 4 陈子健、钟伟峰，《预测威权政权的镇压：一种机器学习方法》[Julian TszKin Chan and Weifeng Zhong, “Predicting Authoritarian Crackdowns: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Mercatus Working Paper (Mercatus Cente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January 2020).]
- 5 杰奎琳·约翰逊、克莱顿·L·赛恩，《响动的车轮与军队的忠诚：国

内抗议如何影响军事政变（1951—2005）》[Jaclyn Johnson and Clayton L. Thyne, “Squeaky Wheels and Troop Loyalty: How Domestic Protests Influence Coups d’État, 1951–200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8, Vol. 62, No. 3, pp. 597–625.]

- 6 凯文·科勒、霍尔格·阿尔布雷希特,《革命与军队: 终局游戏政变、不稳定性与民主的前景》[Kevin Koehler and Holger Albrecht, “Revolutions and the Military: Endgame Coups, Instability,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Armed Forces & Society*, 2021, Vol. 47, No. 1, pp. 148–176.]
- 7 奥伊辛·坦西,《“民主政变”论题的局限: 国际政治与政变后的威权主义》[Oisín Tansey, “The Limits of the ‘Democratic Coup’ Thesi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ost-Coup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016, Vol. 1, No. 3, pp. 220–234.]
- 8 奥赞·瓦罗尔,《民主政变》[Ozan O. Varol, “The Democratic Coup d’État,”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2, Vol. 53, No. 2, pp. 291–356.]
- 9 同上。
- 10 埃丽卡·切诺韦思、安德鲁·霍金、佐伊·马克斯,《非暴力抵抗战略的作用模型》[Erica Chenoweth, Andrew Hocking, and Zoe Marks, “A Dynamic Model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Strategy,” *PLOS ONE*, 2022, Vol. 17, No. 7, Article e026997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69976>.]